



毛磊 ○ 著

面子和风险态度的 经济学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ace and risk attitude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面子和风险态度的 经济学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ace and risk attitudes

毛磊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子和风险态度的经济学分析/毛磊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303-21773-1

I. ①面… II. ①毛… III. ①农村劳动力—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国 IV. ①F3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5326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MIANZI HE FENGXIAN TAIDU DE JINGJIXUE FENX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马洪立

责任编辑: 薛 萌

美术编辑: 袁 麟

装帧设计: 袁 麟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序 言

经典经济学理论假定人类在做抉择时是风险中性并且仅仅最大化物质利益。本书不同于经典经济学理论假定，而是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风险态度和社会映像问题。本书的第1章探讨，在田野环境下，人们不同的风险态度如何影响他们的迁移抉择。本书接下来的两章探讨：人们是否愿意牺牲物质利益来维持自己或者他人的社会映像及人们是否在映像上表现出互惠行为？

风险态度是指人类怎样意识、领会并且对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事件做出反应。在证券市场上，股票交易员必须对上市公司不断变化的股票价格做出迅速反应，并且在买进和卖出股票前，对操作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损失进行估计；在信贷市场上，信贷经理必须对公司的资质和竞争力进行评估，并且在给公司贷款前估计违约风险。在做决定的时候，人们需要估计失败和成功的可能性并且估计他们能承受多大程度收入的变化，所以对个人风险态度的研究对理解经济行为是极端重要的。

对于固定概率风险、不确定性概率风险和策略性风险这三种不同不确定性进行划分，这对于理解风险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固定概率风险，决策者知道每一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对于不确定性概率风险，决策者不知道每一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对于策略性风险，每一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仅仅取决于决策者自己的选择而且也是由其他决策者的选择而决定的。

本书第1章探讨人们的风险态度是否和他们外出迁移相关,具体来说,即哪一种风险态度能够更好地决定他们是否选择外出迁移。确实,跨国和跨地区的迁移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普遍和重要的现象。根据联合国全球迁移统计(United Nation global migration statistics),跨国迁移者的数量在最近几十年增长迅速。在2013年,全世界有2.32亿人跨国迁移,占全球人口的比率为3.2%。从经济视角来看,劳动力迁移对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外出迁移对计划外出迁移的人来说是一个关键和充满风险的决策。计划外出迁移的人可能在流入地面临不可预测的生活环境和面对工作竞争。除此之外,迁移者不得不放弃在他们家乡的社会网络,而对是否能在流入地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网络仍不得而知。总而言之,外出迁移是一个充满多种不确定性的过程。然而在当前文献中,对个人风险态度和他们外出迁移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相对比较缺乏的(Jaeger *et al.*, 2010, Williams and Balaz, 2012)。此外,具体哪一类风险态度能够解释个人的外出迁移决策仍旧没有得到回答。

在本书第1章,我们利用一个在中国进行的拟田野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来收集田野环境下激励相容的个人风险态度数据,并且将此数据和个人是否外出迁移进行联合分析。在流入地的外出迁移者和在家乡的留守者被召集和邀请参加这个实验。我们将留守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居住在有较高比例外出迁移者地区的留守者;另一类则是居住在有较低比例外出迁移者地区的留守者。对于这两类留守者的比较使得我们可以控制因为外出迁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我选择原因所导致的人群风险态度分布发生变化——更偏好风险的个人首先选择迁移到其他地区,而更厌恶风险的个人则选择留在他们的家乡。

激励相容的任务被用来诱导实验参与者对固定概率风险、不确定性概率风险和策略性风险的态度。我们的结果表明外出迁移和更高的策略性风险态度相关——相较于居住在有较多外出迁移者地区的留守者,外

出迁移者在竞争性环境中表现出更高的竞争性倾向。此外相较而言，居住在中国东部的实验参与者和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实验参与者在固定概率风险和不确定性概率风险上表现出显著的区别。居住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实验参与者在风险态度上的这种差别表明，由于中国渐进转型为市场经济导致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东部和中国西部的影响力上存在差异，而这可能导致当地居民的行为偏好差异。

本书第2章研究个人行为是如何受到映像和群体身份的影响。目前经济学文献已经确认来自其他人社会赞同所造成的正向映像和违反社会准则而导致的负向映像会极大地影响个人行为（Johansson-Stenman and Martinsson, 2005; Alpizar *et al.*, 2008; Ariely *et al.*, 2009; Lacera and Macis, 2010; Johansson-Stenman and Svedsater, 2012）。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这种获得社会认同的动机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维护自己和他人脸面在儒家文化中受到特别的强调。

本书第2章研究人们是否愿意放弃他们的一部分物质利益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映像——在一个工作群体中，要求表现最差的人公开暴露可能会造成一种尴尬。我们的设定允许测量维护社会认同的动机如何使得人们偏离完全物质利益最大化策略并且表现出维护自己 and 他人映像的趋社会性(pro-socially)行为。在我们的实验中，人们可以损失一部分物质利益来避免自己或其他群体成员公开暴露。此外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通过引入群体身份来构建，人们或者和具有相同群体身份的人进行配对，或者和具有不同群体身份的人进行配对(Akerlof and Kranton, 2000)。

本书第2章发现大多数表现最差的人选择支付一定成本来避免自己公开暴露。相当比例的实验参与者愿意损失一部分物质收入来避免其他人丢脸。不管群体成员间的社会距离发生什么改变，实验参与者都表现出这样的利他行为。此外，表现最差的成员的公开暴露使得他们在下一阶段的努力程度发生显著变化——在其他实验参与者前公开暴露表现最差者在实验的下一个阶段减少了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对表现最差者的公

开暴露挤出了他们努力工作的内部激励。

这些发现填补了之前的研究空白，发现映像对趋社会性贡献、合作和努力程度等都有着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人们不仅仅关注他们的自我映像而且也在意其他人的映像，即使这会减少他们的金钱收益。人们愿意维护其他人的自尊对分析人类社会交往和联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书第3章将对映像的研究扩展到互惠行为。该章特别探讨人们是否在映像上表现出互惠行为，以及映像互惠的存在是否影响人们的努力程度。实验中存在的互惠作为一种重要工具使得人们愿意关注其他人的收入并使得总体福利取得帕累托改进(Kirchler *et al.*, 1996, Fehr *et al.*, 1998, Fehr *et al.*, 1997, Fehr *et al.*, 1998, Fehr *et al.*, 2002, Falk, 2007, Blumenstock, 2011)。和这些经验研究一脉相承的是，经济学家已经将互惠行为包括在理论模型中以更好解释人类行为(Charness and Rabin, 2002, Falk and Fischbacher, 2006)。

然而当前大多数经济学文献聚焦于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互惠行为，在本章我们将关注非物质利益存在的互惠行为，具体来说则是映像互惠。在贸易谈判和商业交往中，人们保持互相尊重和避免在公共场合引起尴尬是非常明智的举措。正因为这种社会认同和尊重的重要性(Ellingsen and Johannesson, 2007, 2008a)，维护了他人自尊和避免他人尴尬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友善行为，并且常常获得对方的善意回报；相反伤害其他人的自尊或者没有采取行动来避免他人的尴尬常常会招致对方的报复。

本书第3章的实验设计使得实验参与者能够对对方的善意行为用公开表扬的方式进行回馈以验证正向互惠行为；另外，实验参与者能够通过避免对方优秀表现受到公开表扬的方式来惩罚对方之前的非善意行为。本章最后检验映像互惠的存在是否影响人们在任务中的努力程度。

我们的实验发现实验参与者正向回馈其他人在映像方面的善意行为，此外我们也观察到非直接的互惠行为——实验参与者回馈其他人对

第三方映像的善意行为。与此相反，我们没有发现实验参与者报复其他人在映像方面的非善意行为。从问卷中收集的数据显示受到公开暴露的表现最差者报告了最高的负面情感，而被公开暴露的表现最佳者报告最强烈的快乐情感。而这样的发现解释了人类正向互惠行为的心理基础——避免他人负向情感和激发他人正向情感的行为导致他人的正面反馈。本书使我们对风险态度和社会映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未来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目 录

第 1 章 策略不确定性和劳动力迁移决策：一个在中国的田野实验	1
1.1 简 介	2
1.2 相关文献	5
1.3 被试招募和实验设计	8
1.3.1 被试招募和实验地点	8
1.3.2 实验设计	10
1.4 结 果	15
1.4.1 人口统计	16
1.4.2 风险、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偏好	17
1.4.3 策略不确定下的竞争性偏好	20
1.5 讨 论	22
1.6 结 论	23

第 2 章 留面子：一个关于映像和群体认同的实验	59
2.1 导 言	60
2.2 相关文献	64
2.3 实验设计和实验过程	66
2.3.1 实验组(Treatments)	66

2.3.2 实验过程	69
2.4 行为假设	70
2.5 结 果	73
2.6 讨论和总结	85

第3章 映像互惠：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97

3.1 导 论	98
3.2 相关文献	100
3.3 理论模型和预测	102
3.4 实验设计和实验过程	105
3.4.1 实验组	105
3.4.2 实验过程	108
3.5 结 果	109
3.6 讨论和结论	119

参考文献 141

后 记 161

第 1 章

策略不确定性和劳动力迁移决策： 一个在中国的田野实验^①

① 本章是作者和郝丽、Daniel Houser 和 Marie Claire Villeval 的合作工作，在此感谢从法国国家研究局和乔治梅森大学经济跨学科研究中心所获得的资金资助。

1.1 简介

劳动力迁移在重新配置劳动力到使其能发挥最大价值的职位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劳动力迁移因而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车轮运转的润滑剂”（Borjas, 2001）。因此理解劳动力迁移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哪些类型的人选择劳动力迁移？这些迁移者有哪些共同的特征？过去几十年对劳动力迁移决策个人决定因素的兴趣在迅速增加，这些因素包括期望的收入差距（Harris and Todaro, 1970；Brucker and Jahn, 2011）；个人收入在流出地所处相对位置（Stark and Taylor, 1991）；年龄和教育（Sjaastad, 1962；Schwartz, 1976；Chiswick, 1986；Malamud and Wozniak, 2012）；家庭和个人网络（Boyd, 1989；Pedersen *et al.*, 2008；Munshi, 2003）；流入地迁入者的数量（Mora and Taylor, 2005）；在技能上的不对称信息（Katz and Stark, 1987；Chen, 2005）。

在本章，我们关注个人风险偏好和他们是否选择外出迁移之间的关系。迁移到一个新环境中的决策包括多种不确定性，在刚刚完成迁移的时候这些不确定性更是特别巨大，如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收入、住房和生活方式都存在不确定性预期。尽管早期的理论文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重要性（Stark, 1981；Stark and Levhari, 1982；Katz and Stark, 1986），然而在对迁移的经验研究中发现仅有非常少的文献测量了个人的风险偏好（Williams and Balaz, 2012）。而且文献中的经验数据大部分来源于调查和问卷中自我报告的风险偏好，而这些数据并不是采用激励相容的方式收集的（David, 1974；Stark and Levhari, 1982；Guiso and Paiella, 2006；Gibson and McKenzie, 2009；Jaeger *et al.*,

2010; Czaika, 2012)。例如, Jaeger *et al.* (2010) 使用来自德国的数据^①发现外出迁移倾向是和承担风险的意愿正向相关。本章的研究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采用激励相容的田野实验方法来直接测量风险偏好并研究风险偏好和外出迁移倾向之间关系的工作^②。

我们在中国进行实验, 当前这里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 (Meng *et al.*, 2010)。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首先开始于 1978 年的中国东部和南部, 当时对于劳动力迁移的限制也逐渐放松 (Lin *et al.*, 1998; Zheng *et al.*, 2003)。农村富余劳动力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人口占整个中国人口的比重达到 80%) 开始迁移到城市区域, 并在迅速扩张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寻找工作机会。外出迁移人口规模不断上升, 在 2012 年外出迁移人数就超过 2.6 亿^③。这些外出迁移工人主要是低技术工人, 他们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 生活节俭以汇钱返乡资助家庭其他成员。

本章报告的数据来源于拟田野实验, 探讨中国外出迁移者和留守者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态度上是否是不同的。我们的被试者既包括外出迁移者也包括留守者。外出迁移者是那些工作在城镇, 但户籍并不在当地的人^④。而外出迁移者或者说留守者则是那些留在家乡的人。我们诱导每一位被试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偏好, 以及在策略性不确定环境中的竞争性偏好。

第一, 我们的实验包括以下一些重要设计细节, 首先有两种类型留守者: (1) 那些居住在有很少外出迁移者所在地的留守者; (2) 那些居住

① Jaeger *et al.* (2010) 使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调查数据 (SOEP) 用以测量风险, 通过调查者对问题“冒风险的总体意愿”的 11 个度量点的选择来对风险进行测量, 但对参加调查的受访人并没有经济激励。

② McKenzie 和 Yang (2012) 解释用实验方法研究劳动力迁移的优点。

③ 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流动劳动者 2012 年年报: http://www.stats.gov.cn/tjfx/jdxf/t20130527_402899251.htm。

④ 这是一个中国统计局所使用且得到大多数认同的定义。

在有很多外出迁移者所在地的留守者。我们假设这两种类型留守者有不同的偏好。如果外出迁移确实是一个自选择过程——风险偏好者选择外出迁移；而风险厌恶者则选择留守(Umblijs, 2012)，那么有许多外出迁移者所在地的留守者应该具有最高风险厌恶，而外出迁移者则具有最高风险偏好。一方面，因为大规模的外出迁移会使得留守者在当地寻找工作时面临的竞争不是那么激烈(Mishra, 2007; McKenzie and Yang, 2012)，因此留守者可能竞争性偏好也较低；另一方面，那些只有较少外出迁移者所在地的留守者仍旧包含风险偏好者和风险厌恶者。这使得我们可以假设三个群体的风险偏好：有许多外出迁移者所在地的留守者是最厌恶风险的，而仅有少数外出迁移者所在地的留守者风险厌恶程度居次，而外出迁移者则是风险偏好程度最高的^①。

第二，我们在中国东部和中国西部进行实验以探寻地区间差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中国东部首先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然后渐渐扩展到中国西部(Lin *et al.*, 1998; Zheng *et al.*, 2003)，所以居住在东部中国的居民对市场经济更加熟悉、更能接受工资差异和价格变化。因此我们预测居住在东部的中国人更加偏好风险，而这可能影响他们的外出迁移倾向。

第三，我们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情境不确定性和策略不确定性。情境不确定性是指在可能性分布确定和不确定时的不可预知结果(Ellsberg, 1961; Fox and Tversky, 1995)。策略不确定性则源于其他参与者在互动决策情境中的有意行为(Brandenburger, 1996)。外出迁移使得外出迁移者必须面对其他外出迁移者和当地居民的竞争，

① 外出迁移在一些地区出现，而在另外一些地区没有出现的大部分原因要归因于历史因素。中国的外出迁移者极度依赖社会网络来了解新地点的工作前景(e.g., Zhao, 2003; Giles, 2006; Chen *et al.*, 2010)。只要第一批人外出迁移，则留守者有可以获取外出迁移的更多信息，而这能降低不确定性，结果导致更多的外出迁移。

而这就包括其他决策者的策略性因素^①。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使用激励性的彩票决策来诱导风险和不确定性偏好，并使用 Camerer and Lovo (1999) 的市场进入游戏来诱导竞争性偏好，如存在损失风险的策略不确定偏好。因为收入的不公平性能够产生一种相对剥削感或者相对满足感，而这两种感觉会影响个人的迁移决策 (Stark and Bloom, 1985)，因此我们最后将不公平性厌恶测量包括在我们的实验中。然而结果是不显著的，我们对此做了简要的评述。

我们的主要发现是外出迁移者比留守者更加显著地愿意进入策略不确定性情况下的竞争；然而不同群体在情境不确定性下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态度上没有表现出差别。我们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这是第一个通过提供激励的田野实验方法来探讨风险偏好和迁移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我们首次研究不同风险和不确定性来源的影响，换句话说，扔骰子所产生的情境不确定性下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和由于他人预期和行为所导致的策略不确定性。这种划分是很重要的，一般研究所使用的提供激励的彩票诱导偏好的方法经常被认为仅有非常弱的预测力 (Dohmen *et al.*, 2005, 2011)，所以检验其他替代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点上，本章通过研究外出迁移者和留守者在真实环境下市场进入游戏中行为上的差别也做出方法论上的贡献。

本章接下来的构成如下：1.2 节简单综述相关文献，1.3 节介绍我们的实验设计，1.4 节报告实验结果，1.5 节对结果进行讨论，最后在 1.6 节进行总结。

1.2 相关文献

本章对两领域的文献有所贡献。第一个领域是风险态度作为劳动力

^① 当一些国家使用签证摇号来从移民申请者中进行筛选时（比如美国的绿卡摇号），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McKenzie and Yang, 2012)。

迁移决策决定因素的文献；第二个领域是诱导风险态度方法论的文献。

在劳动力迁移决定因素的理论文献中，Stark (1981)是第一批将风险偏好作为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主要原因的学者。Stark and Levhari (1982)发现风险厌恶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家庭让一个家庭成员外出迁移到城市地区及多样化家庭的收入组合。Katz and Stark (1986)考虑了跨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表明外出迁移者在考虑未来地位的提升和随后较小风险的基础上，更愿意接受近期更高的风险。Dustmann (1997)研究不确定性怎样影响外出迁移时间和再次外出迁移抉择。而与之之前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上的研究不同，Czaika (2012)根据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的期望理论对迁移决策进行建模：当未来期望偏离基准点时，潜在的外出迁移者会校正他们期望，外出迁移流动对负向经济期望比相同程度的正向期望反应更加强烈。

近期对风险态度和外出迁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而早期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则较少。一个例外来自 Sahota (1968)的研究，他发现巴西的外出迁移者有更高的活力并且更愿意承担风险。相较于早期的理论文献，目前大多数经验研究发现的一个有趣结果是风险厌恶和迁移倾向之间存在着负向联系。Heitmueller (2005)发现对风险厌恶的人外出迁移的意愿更低。在一个在孟加拉国进行的田野实验中，Bryan *et al.* (2012)发现外出迁移决策受到负债及保险供给的影响，而保险供给是对风险态度的一个非直接测量。对风险态度的直接测量包括自我报告的风险偏好。许多研究使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SOEP)来研究外出迁移倾向。具体来说，被调查者通过选择从 0~10 的数值来回答问题“总的来说，你们是否愿意承担风险”，其中 0 代表“不愿意承担风险”，而 10 代表“非常愿意承担风险”。使用 SOEP 数据，并且将外出迁移者定义为在 2000 年和 2006 年改变所在地至少一次的人，Jaeger *et al.* (2010)首次发现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更加愿意外出迁移的直接证据。Constant *et al.* (2011)发现第二代移民相比原住民更加愿意承担风险。

Dohmen *et al.* (2005; 2011) ①研究在特定情境/场景下自我报告的承受风险意愿, 包括驾驶、金融投资、运动/休闲、职业和健康等多种情境。他们发现唯一对受调查者外出迁移决策有预测力的风险测量是自我评估的总体风险偏好。换句话说, 没有一种特定情境下的风险测量对解释外出迁移决策是显著的。这个结果对于从东德迁移到西德的外出迁移者和从西德迁移到东德的外出迁移者都是适用的。Gibson and McKenzie (2009) 使用从三个太平洋国家收集的调查数据, 也发现外出迁移倾向和承受风险的意愿是正相关的。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 Conroy (2009) 在墨西哥报告了相反的结果: 和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妇女相比, 更加厌恶风险的妇女更愿意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 而风险偏好对男性的外出迁移决策则没有预测力。更加厌恶风险的妇女可能将外出迁移作为一种逃避收入高度变动环境的方式。

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使用的从调查问卷中得出的风险偏好测量并没有对准确回答给予任何激励。除了这些调查数据外, Dohmen *et al.* (2005; 2011) 也使用在实验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提供物质激励的彩票诱导方式 (Holt and Laury, 2002; Andersen *et al.*, 2008) 来测量风险态度。他们的实验在被试家中进行, 被试者在那首先完成 SOEP 问卷, 接着参与一个给予报酬的彩票实验 (类似于本章情境不确定性下的风险诱导)。他们发现在预测不同情境和场景中 (例如, 不同的不确定性来源) 的风险行为时, 相较使用提供物质激励的彩票诱导方式, 一般来说, 自我评估的总体风险态度是一个更好的预测指标。他们总结在不同情境和场景下的风险态度并不一致, 这个发现对一般采用彩票诱导风险并用以解释在其他场景下行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一个对于使用提供物质激励的彩票诱导方法的潜在顾虑是被试者不

① 相较 2011 年发表的论文, Dohmen *et al.* (2005) 的工作论文中报告了更加详细的结果, 因此我们讨论的一些结果只存在于这篇工作论文中。